

文革期間的國民經濟

● 楊繼繩

摘要：本文試圖全面而客觀地介紹文革十年間中國的經濟狀況。文革處於第三和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這個時期國民經濟的目標是「備戰，備荒，為人民」，大部分資源投入了以「三線建設」為主的備戰工程。文革中抓經濟的手段是「抓革命，促生產」，即通過階級鬥爭的政治壓力和共產主義精神的鼓勵，促使人們從事生產活動，其具體辦法是開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運動。文革期間知識份子受到打壓，企業管理混亂，科技水平十分落後。十年間，國民經濟三起三落。這樣的經濟增長是靠大量的投入形成的，投入產出比例很不合理。廣大群眾極度貧困，而根本原因是政府消滅了市場、用行政力量配置資源。

關鍵詞：計劃經濟 三線建設 文化大革命 權力下放 經濟體制改革

改革以前的中國實行計劃經濟。由於計劃經濟缺乏技術上的可行性^①，實行得並不順利。

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被認是最理想的計劃。但是，頭三年並沒有計劃。1952年8月提出的〈關於編制五年計劃（1953-1957）的輪廓方針〉和〈五年計劃的任務〉是「一五」計劃頭三年的依據。這個依據將工農業發展速度安排過高，基本建設的規模安排過大，建設資金來源不落實，還鬧出了把上一年度的財政節餘當作當年財政收入的笑話。直到1955年7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才通過了〈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此時，「一五」計劃的時間已經過了兩年半。在執行過程中又出現了幾次失誤，例如1956年比例失調，1957年進行調整。

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期間出現了大躍進，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1961年糧食產量比1957年下降了26.4%，餓死了三四千萬人，被迫進行了五年調整（1961-1965）。

* 本文是將筆者即將出版的專著《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中的一章改寫而成。

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沒有具體計劃，只提出了〈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的初步設想〉。第四個五年計劃(1971-1975)中很多指標是按毛澤東的主觀意志決定的。例如，計劃鋼產量3,500至4,000萬噸，唯一的根據是1957年毛在莫斯科講過十五年鋼產量要達到這個數字^②。文革十年正是第三個和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

專門研究「文革經濟」的學者和專論屈指可數，其中，李成瑞的〈十年內亂期間我國經濟情況分析〉^③引用者最多，陳東林的〈研究「文革」時期國民經濟的幾點思考〉和〈實事求是地評價「文革」時期的經濟建設〉^④很有份量。其他文革經濟的研究成果，分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和通史性著作之中，其中影響較大的有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⑤，房維中的〈我們所經歷的六個五年計劃〉^⑥，柳隨年、吳敢群主編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1949-1983)》^⑦，梁秀峰、李建立的〈新中國國民經濟計劃工作的三十年〉^⑧，馬泉山的《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66-1978》^⑨，曾壁鈞、林木西主編的《新中國經濟史(1949-1989)》^⑩，武力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⑪，陳東林的《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⑫。此外，《當代中國》叢書的相關卷分析了文革時期一些行業、地區的經濟狀況。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也附帶涉及當時的一些經濟情況^⑬。

學界對文革經濟有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是「瀕臨崩潰」^⑭，另一種看法是「沒有停滯，而是在繼續發展」^⑮；還有一些在這兩種看法之間。文革期間，筆者是新華社採訪經濟的記者，除了跟蹤採訪宏觀經濟以外，還多次到工廠跟班勞動，了解工廠裏的真實情況^⑯。本文除了力求客觀地介紹文革期間的國民經濟狀況以外，還指出了文革經濟指導思想的特點：突出戰備、忽視群眾生活；突出精神、忽視物質利益；突出革命、忽視生產；不重視知識份子和科學技術，同時分析了這種指導思想造成的嚴重後果，以及工農大眾極度貧困的情況及其制度原因。

一 經濟建設的目標：「備戰，備荒，為人民」

大饑荒後，中國人把肚皮放在第一位。在討論「三五」計劃時陳雲提出：「農業問題，市場問題，是關係到五億農民和一億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問題，是民生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應該成為重要的國策。為了農業、市場，其他方面『犧牲』一點，是完全必要的。」當陳雲講到準備採取「傷筋動骨」的辦法改變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高指標時，周恩來插話說：可以寫一副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⑰。「三五」計劃原來的重點是解決吃、穿、用的問題。「用」就是陳雲說的市場問題，即市場供應緊張、民用商品短缺。根據這個指導思想，1964年4月下旬，國家計劃委員會提出了〈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的初步設想(匯報提綱)〉。

毛澤東對這個「初步設想」很不滿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⑮：

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的危險。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甚麼時候要打仗。決定戰爭最後勝利的不是原子彈，而是常規武器。要搞三線工業基地建設，一二線也要搞點軍事工業。各省都要有軍事工業。要自己造步槍、衝鋒槍、輕重機槍、迫擊炮、子彈、炸藥。有了這些東西，就放心了。

8月7日、20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要準備帝國主義可能發動的侵略戰爭。他說，現在工廠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不利於備戰，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戰略後方。這次會議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設三線。1965年6月16日，周恩來到杭州和毛澤東一起聽余秋里匯報「三五」計劃的設想^⑯。毛說：「必須立足戰爭，從準備打仗出發，把加強國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線建設，改變工業布局，發展農業，大體解決吃、穿、用，加強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把屁股坐穩，發揮一二線的生產潛力，有目標有重點地積極發展新技術。」周把毛的這個意見概括為「備戰，備荒，為人民」^⑰。三線不完全是防外敵，也是防內部出修正主義。毛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如果出了赫魯曉夫，那有小三線好造反。」^⑱

從1965到1980年，對三線地區的基本建設投資總計2,052.68億元，佔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39.01%。在1966到1970年的「三五」時期，這個比重為49.43%，幾乎佔了全國總投資的一半^⑲。

不過，三線建設存在嚴重問題：第一，片面強調戰備要求，建設規模過大，戰線拉得過長，「邊設計，邊施工，邊投產」，造成了巨大的浪費和不必要的損失；第二，三線工廠按「靠山，分散，隱蔽」的原則布置，許多工廠建設在偏僻的山溝和洞穴裏，給交通運輸、配套協作、生產管理造成很大的困難；第三，由於涉及軍事機密，三線工廠是封閉的，對周邊經濟沒有帶動作用，還與周邊農村矛盾重重。

三線建設的投資效果是歷史上最低的。以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為例，三線地區「三五」時期為46.7%，比混亂的大躍進時期的62.2%低；「四五」時期為55.8%，低於大躍進時期，也比其他時期更低^⑳。1965到1980年國家投資形成的固定資產，全國為3,409.78億元，三線形成的固定資產為1,145億元^㉑。這就是說，國家投入佔全國投資總額39.01至49.43%的資金，形成的固定資產只佔全國的33.6%。

三線工廠集中了大批科技人員。他們生活艱苦，技術專長得不到發揮，子女的教育問題也無法解決。他們抱怨：獻了青春獻終生，獻了終生獻子孫。

到了1980、90年代，由於三線工廠在產品結構和市場競爭力方面，都不能適應新時期的需要，有的被關閉、停產，有的被合併、轉產，有的遷往城市。在關、停、併、轉、遷的過程中，不僅耗費了大量的資金，職工的利益也受到損害，留下了無窮的後患。2002年12月，筆者因查閱大饑荒檔案到中共貴州省委大院，看到數百人衝進省委大院請願，他們是三線工廠的職工，要求省委解決三線建設遺留的問題。

三線建設雖然問題很多，但也不能抹殺它的成就。「三五」、「四五」期間，在西部的荒山野嶺建立了一批新興工業城市，如攀枝花市、六盤水市、十堰市、金昌市，成了著名的鋼城、煤都、汽車城、鎳都。幾十個古老的縣鄉城鎮成為現代化的工業科技都市和交通樞紐，如綿陽市、德陽市、都勻市、凱里市、天水市、寶雞市、漢中市、曲靖市、格爾木市等。三線建設在中國西部地區建成了一大批工業和交通基礎設施，新增了科技力量，提高了西部地區的工業水平。從1965年起，相繼建成了一批重要鐵路和公路：川黔、貴昆、成昆、湘黔、襄渝、陽安、太焦、焦枝等，共新增鐵路8,046公里^⑤。

「備戰，備荒，為人民」的目標，把「為人民」放在第三位。由於資金大多用於備戰，「為人民」這個目標沒有落實。用於戰備的資金不僅僅是三線投資，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都設立了「國防工業辦公室」，通過「軍工動員」的方式，向生產民用產品的工廠下達常規武器和其他軍用品的生產任務。「軍工動員」是強制性的，是不惜代價、不計成本的。「軍工動員」產品所耗費的資金是無法統計的，在財政支出中，也不納入「國防費用」這一項。

國防工業建設所需要的資金，靠壓縮居民消費來積累。這可從積累（即非消費資金）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例（簡稱積累率）中表現出來。文革的頭三年，由於社會比較混亂，積累率有所下降。從1970到1976年這七年，除了1976年因唐山大地震使基建工程受影響以外，其餘年份都在31.4%到34.1%之間。按當時中國經濟發展水平，31%以上的積累率就過高。不僅積累率過高，而且在基本建設投資的使用方向上，生產性建設的比例大大高於非生產性建設（住宅、醫院、學校）。文革十年期間，生產性建設投資佔82.8%。老百姓糧、肉、油、布的消费提高很少，食用油的消費還有所降低^⑥。當時，農民一年也吃不上一兩次肉。雖然國家發了肉票，但很難買到肉。一旦肉店殺豬，人們頭天晚上就拿着肉票到肉店排長隊。農民破衣爛衫，國家幹部也穿打補丁的衣服。直到1980年代幾個大化纖廠投產以後，才基本解決了穿衣的問題。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來看，文革期間的居民消費水平十分低下，而且增長緩慢（表1）。

表1 文革期間居民年平均消費水平（元/人）

年份	居民消費水平		
	全國居民	農民	非農業居民
1965	125	100	237
1966	132	106	244
1967	137	111	251
1968	132	106	250
1969	135	108	255
1970	140	114	261
1971	142	116	267
1972	147	116	294
1973	155	123	306
1974	155	123	314
1975	158	124	324
1976	161	125	340
1977	165	124	361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頁454。

為了把更多的資金用於重工業和備戰，政府不得不壓低職工的工資水平。文革時期全民所有制職工的工資水平比文革前的1964、1965年還要低（表2）。大躍進時期（「二五」）和文革時期（「三五」、「四五」），職工工資年平均增長速度不僅沒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表3）。

表2 全民所有制職工平均工資（元）

年份	各部門平均	工業
1964	661	741
1965	652	729
1966	636	689
1967	630	701
1968	621	689
1969	618	683
1970	609	661
1971	597	635
1972	622	650
1973	614	640
1974	622	648
1975	613	644
1976	605	634
1977	602	632
1978	644	683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4）》，頁459。

說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工資水平比實際情況要高。1975年筆者到天津拖拉機製造廠調查，80%以上的工人是二級工，月薪41.5元。

表3 不同時期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工資年平均增長速度（%）

	「一五」 時期	「二五」 時期	1963至 1965年	「三五」 時期	「四五」 時期	「五五」 時期
貨幣工資	7.4	-1.5	3.3	-1.4	0.1	5.5
實際工資	5.4	-5.4	7.2	-1.2	-0.1	2.9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4）》，頁460。

說明：「實際工資」是扣除生活費用價格上漲後的工資。

二 經濟建設的手段：「抓革命，促生產」

毛澤東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多次表示，蘇聯變成修正主義與搞「物質刺激」有關。高舉「三面紅旗」也好，發動文革也好，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改造人性，要把中國人改造成「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新人」。文革期間，經濟工作中也按這個指導方針辦事。毛主席限制按勞分配，實行差

別不大的分配政策，以精神鼓勵為主。「抓革命，促生產」，就是通過革命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典型引路」，是共產黨領導全域的一個重要方法。「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也是通過樹立、宣傳兩個典型來推動的，這就是「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

1959年9月6日，石油勘探工作者在東北松遼盆地陸相沉積岩中發現工業性油流。時值國慶十周年，遂將這塊油田命名為「大慶」。1960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轉了石油部提交的報告，同意進行大慶石油會戰。這時正是大饑荒最嚴重的時刻。同年5月，在時任石油工業部正、副部長余秋里、康世恩等人的領導下，石油工業部集中全國30多個石油廠礦、院校的40,000名職工，調集70,000多噸器材設備，來到松遼大草原。人們支起帳篷、搭起活動板房辦公、住宿。沒有起重設備，人拉肩扛加滾槓，把幾萬噸的設備器材從火車上卸下來，拖到幾公里之外的井場上安裝起來。經歷三年多的艱苦會戰，1963年底拿下了一個大油田，探明儲量為267,000萬噸，建成了年產原油幾百萬噸的生產規模和大型煉油廠的第一期工程，三年多累計生產原油1,000多萬噸。這是三年大饑荒以後石油工人送給中國人的一份厚禮^⑳。

1964年2月13日，在人民大會堂的春節座談會上，毛澤東發出號召：「要鼓起勁來，所以，要學解放軍、學大慶」，「要學習解放軍、學習石油部大慶油田的經驗」^㉑。大慶的主要經驗是甚麼呢？石油工業部關於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報告，概括為以下幾條：第一，把毛澤東思想與具體實踐相結合。大慶人通過學習毛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靠「兩論起家」；第二，自始至終地堅持集中領導同群眾運動相結合的原則，堅持高度革命精神和嚴格科學態度相結合的原則，堅持技術革命和勤儉建國的原則；第三，認真學習解放軍的政治工作經驗；第四，大搞技術練兵，大搞增產節約，充分發揚政治、生產技術和經濟民主，領導幹部親臨生產前線，積極培養和大膽提拔年輕幹部，等等^㉒。

1965年1月4日，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介紹了大慶油田的經驗，向全國發出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的號召。

大慶油田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在經濟建設中起了一些鼓勵作用。但這種「革命加拼命」的態度，造成了許多不應有的傷亡。在成昆鐵路通車的時候，同時建立了一座成昆鐵路烈士紀念碑，在鐵路上面有227個墳頭，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八師犧牲的烈士。在全長1,100多公里的鐵路沿線上，這樣的墳頭有一千多處。1968年，一條4,000多米的隧道塌方，一下子就埋進了半個排的戰士^㉓。大慶油田的開發是採用軍事化組織，建立各級指揮部，用行政命令指揮生產。這為「瞎指揮」留下了空間。瞎指揮，「大會戰」，節日前搞「獻禮」，硬壓不切實際的高指標，這些非科學、非經濟的做法，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門造成了很嚴重的後果。大慶油田提倡「先生產，後生活」，職工都住在乾打壘的土房子裏，生活十分艱苦。

1966年4月，中共中央批發了一個文件，說獎金制度是不符合政治掛帥精神，認為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不是靠工資、工分以外的物質獎勵，而是靠毛澤東思想，靠政治掛帥^⑤。此後，工廠的獎金改為平均發放的「附加工資」。工廠裏不斷組織工人批判「獎金掛帥」、「物質刺激」。過份強調精神作用，一時鼓動起來的熱情不能持久；長期漠視職工的經濟利益，挫傷了人們的積極性。

1972年，筆者在天津進行了勞動生產率調查，發現工人八小時工作一般只能幹四個小時。調查中，筆者在天津汽油機廠和工人一起上夜班，發現八十多台設備，白天開動的只有十一到十四台，夜班2點以後開動的只有兩台。開這兩台機器的一個是班長，另一個是被監督勞動的「歷史反革命」份子。這個廠老工人說：「現在我廠一年生產汽油機3,500台。要是把大家的勁鼓起來，工藝設備進行一些改進，不用增加人，一年就可生產20,000台。」不少企業工人加班不給加班費，有的工廠欠工人五十多個休假日也不能兌現；相反，工人遲到幾分鐘也要記下來，累計起來扣工資。天津染料化工行業取消了夜班補助費，工人不願上夜班；化工生產是連續的，夜班開不起來，變成間歇生產，產品質量因而受到影響^⑥。1975年，筆者到天津拖拉機廠金工車間緊固件工段勞動了一個月，和工人一起三班倒。為了檢測工人的勞動潛力，就在一台萬能銑牀上加工一個零件（清華畢業的人都會開機牀），且不緊不慢，工人休息時筆者也休息，一個夜班出的活兒竟超過了定額（即每個班的工作量）的一倍！這樣幹了兩天，一位老工人對筆者說：「楊同志，你是飛鴿牌，我們是永久牌，你要悠着點！」工人擔心，如果廠裏知道了筆者輕鬆地超定額一倍，就要提高定額。

至於發展農業的主要途徑是「農業學大寨」。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一個山村，是一個生產大隊。1963年夏，大寨遭遇大洪水，房屋被沖毀，苦幹了十幾年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沖垮。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和大寨黨支部不要國家救濟糧，不要國家救濟款，不要國家救濟物資。大寨社員搶修梯田，重建房屋，搶種莊稼，經過幾個月的苦幹，在大災之年獲得了大豐收。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記者莎蔭、范銀懷寫的通訊〈大寨之路〉，並發表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大寨之路〉一文記述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說：「集體化的優越性，說不完，用不盡。」《人民日報》社論說：「只要人們有了建設社會主義的雄心大志，充分發揚革命精神，並且把革命幹勁和科學態度結合起來，就一定能夠使大地變樣，使河山易色，創造出偉大的成績。」^⑦在1964年12月召開的三屆人大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大寨「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村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還把大寨的經驗概括為：「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⑧

隨着階級鬥爭的調子提高，大寨從農業生產的典型，演變為抓階級鬥爭的典型。山西省委說大寨「從來沒有放鬆過對資本主義勢力的鬥爭」；學大

寨，「不僅是一次生產革命運動，實際上也是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⑳。文革中對「大寨經驗」又進行了「新的概括」：大批資本主義，大批修正主義，大幹社會主義，真想共產主義^㉑。

為了開展「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不少地方殘酷打擊對運動有不同看法、持消極態度的人。大寨所在的昔陽縣被批判處理的幹部群眾有1,372人，全縣每1,000個人中就有6個被批判處理過^㉒。另一資料顯示，被批判並且被戴上各種「帽子」的，就有2,000多人；立案處理過的超過3,000人，每70多人中就有1個^㉓。虛報學大寨成績的情況更是普遍。在陳永貴治下，從1973到1977年，昔陽縣虛報糧食產量37,262萬斤，比此期間的實際產量誇大了24%^㉔。為保證「大災之年大豐收」，陳審批昔陽縣的氣象報告，有意誇大災情；少報土地數量，從而擴大單位面積的產量。新華社記者李玉秀懷疑大寨少報了土地面積，被陳弄到大寨勞改，讓他開山造地，「把多說的地造出來」^㉕。

1975年1月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經毛澤東和周恩來共同提名，陳永貴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周對陳寄以希望，對陳的工作也說得十分明確：「你是農民代表」，主要任務是「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國」^㉖。陳一成為全國抓農業生產的主要領導人，就大力推行「普及大寨縣」運動。除了有具體的生產指標以外，主要是推廣大寨的抓階級鬥爭和政治工作經驗。在「普及大寨縣」運動中，追求「一大二公」，準備將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隊轉向大隊。8月14日，陳向中央提出，要在全國逐步推廣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有的地方借「學大寨」的名義，全部收回了社員的自留地，連農民自己搞的開荒地也一併收回。有的地方乾脆不讓農民搞家庭副業生產，不許農民養豬、養雞。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農民成年累月地被推向「改天換地」的苦役之中，開墾荒山，圍湖造田，植被被毀，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

「抓革命，促生產」，除了激發革命熱情、將這種熱情用於生產建設以外，另一個重要含義就是通過「抓革命」施加政治壓力。在強大政治壓力下，人們不敢懈怠，生產就「促」上去了。對生產領導部門的務實派來說，「抓革命，促生產」還有另一種意義：他們在搞生產建設的時候，總是在前面冠「抓革命」三字——實際上「抓革命」是虛，「抓生產」是實。文革派批評這種做法是「以生產壓革命」。1967年初，全面奪權開始，大批幹部被打倒，許多幹部只「抓革命」，不敢「抓生產」，生產一度下降。也有些地方，當權派成立「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簡稱「抓辦」）來控制權力，用以對抗文革派。1967年7月14日，周恩來對解放軍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說：「抓辦，抓辦，抓辦裏壞得很。」^㉗就是指後一種情況。

三 國民經濟的增長與波動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文革十年間，全國社會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年增長率為4.9%^㉘。現將文革期間主要經濟指標數據列表

如下(表4)。李成瑞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文革期間的經濟數據，儘管有若干估算成份，但數字來之有據，又經過反覆核算，可以說是基本可靠的^④。

表4 文革期間幾個主要經濟指標的增長率(%)

年份	社會總產值	其中		國民收入
		工業總產值	農業總產值	
1965	119.0	126.4	108.3	117.0
1966	116.9	120.9	108.6	117.0
1967	90.1	86.2	101.6	92.8
1968	95.3	95.0	97.5	93.5
1969	125.3	134.3	101.1	119.3
1970	124.1	130.7	111.5	123.3
1971	110.4	114.9	103.1	107.0
1972	104.4	106.6	99.8	102.9
1973	103.6	109.5	108.4	108.3
1974	101.9	100.3	104.2	101.1
1975	111.3	115.1	104.6	103.3
1976	101.4	101.3	102.5	97.3
1977	110.3	86.2	101.6	107.8

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年鑒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經濟年鑒(1988)》(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88)，「國民經濟統計資料和專題分析」，頁XI-13、XI-17、XI-22。

說明：以上一年為100。

數據表明，文革十年國民經濟有所增長，但是與其他時期相比，除了「二五」時期(大躍進年代)以外，「三五」和「四五」(即文革十年)時期的經濟增長率是最低的(表5)。這說明，如果沒有文革，按照1963至1965年的趨勢發展，經濟增長會更快一些。

表5 各個時期的主要經濟指標的年平均增長率(%)

年份/時期	社會總產值	工業總產值	農業總產值	國民收入	國內生產總值
「一五」時期	11.3	18.0	4.5	8.9	9.1
「二五」時期	-0.4	3.8	-4.3	-3.1	-2.2
1963至1965年	15.5	17.9	11.1	14.7	14.9
「三五」時期	9.3	11.7	3.9	8.3	6.9
「四五」時期	7.3	9.1	4.0	5.5	5.5
「五五」時期	8.3	9.2	5.1	6.0	6.3
1953至1983年	8.0	10.1	4.0	6.2	
1979至1983年	8.2	7.9	7.9	7.1	

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年鑒(1988)》，頁XI-7。

文革十年間，國民經濟時起時落，呈波浪狀態。經濟學界稱之為「三起三落」：

大饑荒以後的經濟調整，到1965、1966年出現了明顯的效果。1965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增長20.4%，1966年上半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同期增長20.3%，雖然下半年受文革的影響，但1966年全年工業總產值還是比上一年增長20.9%，社會總產值比上一年增長16.9%。1967、1968年兩年「天下大亂」，生產秩序被破壞，有些地方停工停產，經濟急劇下降。以社會總產值為例，1967年比上一年下降了9.9%，1968年又比上一年下降了點4.7%（表4）。

隨着各省革委會的建立和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社會趨於穩定，1969到1973年經濟發展較快。然而，社會秩序稍一穩定，主政的官員就企圖搞「躍進」。1970年2月15日至21日，國務院召開全國計劃會議，這次會議成了發動經濟躍進的動員會議。會議確定1970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长17%，基建投資比上年增长46%，大中型建設項目1,113個，主要產品產量也定出了很高的指標。如鋼產量指標增長幅度高達20至27.5%。在中央計劃指標的鼓勵下，一些地方要求產量「翻番」，或一廠變多廠^⑤。在重點鋼鐵企業座談會上，鞍鋼、本鋼、武鋼等鋼鐵企業都提出鋼產量要「翻番」。在電力工業會議上，提出到1972年實現「老廠一廠變一廠半，新廠快馬加鞭，發電能力翻一番，縣縣都有電」的口號。1970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长30.7%，社會總產值比上年增长24.1%（表4）。

「小躍進」帶來嚴重後果：在高指標的壓力下，工廠拼設備，採掘業強化開採；建設規模過大；基礎建設戰線過長；職工人數增長過多。1970到1971年，原計劃全民所有制單位增加職工306萬人，實際增加了983萬人。新增職工中有600多萬人是從農村招來的^⑥。經濟建設中出現了難以承受的「三個突破」：職工人數、工資總額、糧食銷售量這三項都突破了國家能夠承受的限度。從1970年下半年開始，就不得不進行調整。但調整力度壓不住擴張的願望，1971年這三項繼續擴張，1972年速度雖然降下來了，但擴張趨勢未除。1973年1月的計劃會議上，還把解決「三個突破」當作一個重要問題^⑦。

1974年，工業總產值才增長0.3%，社會總產值也只是增長1.9%。學界一些人認為，這是「批林批孔」造成的結果。實際上，主要原因與當時解決「三個突破」問題採取的緊縮措施有關。1974年的經濟指標使人們不滿意，11月6日，在長沙聽取李先念匯報國民經濟情況時，毛澤東說：「把國民經濟搞上去。」^⑧1975年，鄧小平主持整頓，對恢復交通運輸秩序和企業管理秩序當然起了作用；但是，毛的「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最高指示，使主持經濟工作的領導人放鬆了緊縮措施，對提高經濟指標起的作用更大一些。1975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同期增長15.1%，社會總產值比上年增长11.3%。這個較高的指標是在上一年較低指標上實現的，實際不是很高（表4）。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及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幾位領導人逝世，對經濟皆有負面影響，這一年經濟增長比1974年還要低。至於這一較低增長與「反擊右傾翻案風」有多大關係，還需要等待相關研究。

「四五」計劃執行的結果是，計劃表上的51種主要經濟指標中有25種沒有完成；計劃力保的30種重工業產品中有18種沒有完成計劃；11種輕工業產品中有4種沒有完成計劃^⑨。

文革十年，農業平均發展速度為3.9%，糧食生產穩步增長，1976年達到5,726億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6億斤。在人口迅速增長的情況下，人均糧食產量由1965年的544斤增長到1976年的615斤^⑩。另一個發人深思的數字是，1956年全國人均糧食產量為620斤，1976年為615斤，徘徊了二十年才回到原點（表6）。

表6 按人口平均糧食產量(斤/人)

年份	1956	1960	1962	1965	1967	1968	1969	1970	1972	1975	1976
糧食	620	430	481	544	579	540	530	586	558	621	615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4）》，頁167。

除了上述的三線建設的成就以外，文革期間也建成了一些技術比較先進的大型企業，如勝利油田、大港油田、攀枝花鋼廠、成都無縫鋼管廠、貴州鋁廠、第二汽車製造廠、德陽第二重型機器廠等，還建成了長江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南京長江大橋、大慶到秦皇島的輸油管道等一些基礎設施。核工業、人造衛星、運載火箭等國防科技在這個時期也有較快的發展。在重大項目的建設方面，集權制國家可以集中各種社會資源，排除各種阻礙，全力以赴地進行，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集中力量幹大事」。朝鮮這樣的弱小國家，在外部世界的強烈反對下，也能造原子彈、氫彈就是證明。但是，集權制國家在「幹大事」的同時，也造成巨大的浪費和無窮的後患。

在文革期間，1958年開始興起的地方「五小」工業（小鋼鐵、小機械、小化肥、小煤窯、小水泥等）也發展較快。這些地方工業為1980年代鄉鎮工業的發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但經濟效益低，對環境污染嚴重，到新世紀大多被清理。

四 效益差、管理亂、技術水平低

文革十年各項經濟指標雖然有所增長，但這種增長是靠多投資，多投入能源、原材料和勞動力而形成的，產生了效益差、管理亂、技術水平低等問題。首先，經濟效益十分低下。每百元積累基金增加的國民收入，「一五」時期為32元，三年調整時期（1963-1965）為57元，十年文革時期只有19.6元。如果按照「一五」時期的水平計算，十年共損失國民收入5,000億元；若按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30%計算，共損失財政收入1,500億元^⑪。1976年全國國營企業虧損總額達117億元，比1965年增加了兩倍。這一年國家財政收入完成776.6億元，比上一年減少39億元^⑫。此外，產品質量差。1971年末到1972年初，據

國家有關部門對8,373種產品檢查，產品合格率平均為45%。同時，工傷事故大量增加。1971年7月，對十一個部的不完全統計，上半年共發生人身傷亡事故和設備嚴重損壞事故2,000多起，死亡2,400多人^⑤。

其次，企業管理混亂。文革中把必要的企業管理當成「修正主義的管、卡、壓」來批判，一些企業雖然訂了規章制度，但沒有貫徹執行。天津染化四廠靛青車間工藝規定溫度在攝氏170至175度的範圍內保溫15小時，工人為了早下班，只保溫14小時，對產品質量影響很大。此外，崗位無定員。天津第二毛紡廠細紗機過去1人看2台，現在15台機器，每班35人。天津冶金局中，同樣的3噸電爐，有的用27人，有的用35人；D5G拉絲機有的單位2人看3台，有的單位1人看5台^⑥。1971年12月到1972年2月的全國計劃會議上，周恩來指出，現在企業管理亂得很，需要整頓^⑦。〈1972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提出了若干整頓企業管理的措施，但這些措施大部分沒有落實。

再次，技術水平低。文革期間是對知識份子歧視最嚴重的時期。1971年7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制訂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提出了所謂「兩個估計」：解放後十七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大多數教師和解放後培養的大批學生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同年8月16日，印有「毛主席批示：同意」七個紅色大字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由中央發向全國各級黨委。雖然這個文件是1971年出籠的，但這體現了毛多年來的看法。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從上到下，普遍輕視知識份子，進而輕視科學技術。

文革時期，科技人員工資普遍較低。1957年中專畢業生當技術員的在1972年拿48.5元，1957年進廠的學徒工（小學文化程度或更低）在1972年是四級工，拿57.6元。許多1958年畢業的大學生，1972年只拿50多元。據筆者調查，一些工程技術人員說：「當時要是不上大學，參軍或當工人就比現在強多了，讀書吃虧了！」比工人更加困難的是，很多科技人員是夫妻分居相隔千里的兩地，這些人沒有家庭生活；每年探親一次，火車費耗盡了一年的積蓄。天津市技術人員中有百分之二十是夫妻分隔兩地的，有的單位百分之三十或更多一些。

文革前，天津市屬研究所51個，文革中關、停、併、轉，砍了一大批，1972年只剩下25個，人員也減少過半。此外，大批科技人員不在科技工作崗位上。據調查，1972年初天津有40%的科研人員當普通勞動力使用。在科技崗位的人也不能全心從事科研工作。南開大學元素有機研究所除了「拉練」、勞動，每年只能工作八個月。在這八個月中，每個星期只有四天業務活動時間。挖地道（備戰）、搬白菜、搞衛生、寫總結，隨便甚麼人，一句話都可以調走。一機部天津電力傳動研究所的技術人員對筆者說：「我們是廉價勞動力，哪裏需要人，不管我們業務多忙，誰都可以把我們吆喝去！」

科技人員受到壓制，科技發展當然不會有創新；不重視科技，技術水平必然落後。1972年，天津市冶金工人37,000多人，其中肩抬、背扛、手工操作的有15,000多人。天津紡織行業中，使用1930年代機械設備的佔55%，天津

機械行業的設備也大多處於 1930、40 年代的水平。天津化工行業生產群青顏料還是用小土窯煉燒，和《天工開物》上所介紹的差不多。天津碱廠是中國化學家侯德榜在 1930 年代提出聯合製碱法（又稱侯氏製碱法）的基地，這種先進的製碱工藝戰後被日本廣泛採用，而天津碱廠 1972 年還在使用比較落後的蘇維爾法（Solvay Process）生產^⑤。

五 工人、農民家徒四壁

1978 年，老記者馮森齡^⑥到 1940 年代工作過的延安調查，看到昔日的「革命聖地」滿街都是討飯的人。他們衣衫破爛，蓬頭垢面。馮在延安東關食堂停留半小時，討飯的就有十七人，都是來自農村。馮又調查到九個縣市，縣縣都有討飯的^⑦。延安邊區時期勞動英雄申長林所在生產隊二十八戶人家，家家都缺糧食，八十多人出去討飯^⑧。

1980 年，新華社記者傅上倫、胡國華、戴國強三人到延安採訪，親眼看到社員薛登恩家全部家當不值 30 元，他們吃的飯像豬食一樣。最早唱《東方紅》的歌手李有源的兒媳對他們說，在 1970 年代，生活實在沒法子了，不得不外出討飯。老鄉的生活水平不如當年李有源唱《東方紅》的時候^⑨。

1970 年代末期，中國的農村一貧如洗。不僅農民家中一無所有，連樹木都砍光燒盡。1950 年代初期，大多數村莊掩映在密密的樹林和竹林之中，其中很多兩人合抱的參天大樹，但到了 1970 年代末期，村子裏幾乎看不見樹木，成了「和尚村」。不僅人窮，生態環境也遭到嚴重的破壞。

1978 年，全國每個農民從生產隊裏得到年平均收入僅有 76 元，其中兩億農民低於 50 元。有 1.12 億人每天能掙到一角一分錢，1.9 億人每天能掙一角三分錢，有 2.7 億人每天能掙一角四分錢。另有一些農民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1980 年，新華社國內部農村組派出幾位記者對西北地區的農民收入進行調查，調查結果是，1979 年全年人均收入，最高的是山西呂梁地區，為 70 元；隴東慶陽地區第二，為 64.86 元；延安地區第三，為 57.2 元；榆林地區第四，為 52 元；甘肅平涼地區第五，為 47.6 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為 36.8 元^⑩。

在城鄉差距中處於優勢地位的工人的生活狀況怎麼樣呢？全民所有制之下各部門職工的工資，除了 1971 年對部分人員有所提高以外，再沒有增加。從 1966 到 1976 年，平均工資不但沒有增加，反而降低了 4.9%^⑪。

1975 年，筆者在天津調查時發現，工廠的生產第一線的工人 80% 以上是二級工，月薪為 41.5 元，再沒有其他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維持最低生活水平。職工家裏沒有任何財產，成了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手錶、自行車、縫紉機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夢寐以求的「三大件」。筆者在天津第一棉紡織廠調查了職工收入情況，從中可見國營大廠職工的收入狀況（表 7）。天津棉紡一廠在當時是待遇較高的國營大廠，其他不少單位職工的收入比天津棉紡一廠低很多。

表7 天津棉紡一廠電動車間在編人員家庭月收入(1975年)

人均收入	人數	佔總人數(%)
10元以下	8	2.32
10-11元	6	1.74
11-12元	7	2.02
13-15元	28	8.11
15-20元	65	18.8
20-25元	231	66.95
總計	345	100

說明：人均收入達25元的只有幾戶。

此外，由於經濟停滯，就業機會少，政府只好強制一千六百多萬城鎮青年上山下鄉，將城鎮就業矛盾向農村轉移。下鄉知識青年不能維持生活，城鎮的工人父母不得不給以接濟。

城市居民的居住條件極端惡劣。1985年，上海市區180萬戶。按國家所公布的標準，有89.98萬戶為困難戶，其中人均住房面積低於4平方米的有21.6萬戶，住房不方便(大兒大女同室)的有24.3萬戶^③。這是改革以後七八年的情況，比改革前還是有所改善。

據筆者1972年在天津房管部門調查得知，在天津，祖宗三代人擠在一間10多平方米房間裏的情況十分普遍。一到晚上，中年夫婦睡在牀上，已經成年的孫子上了小吊樓，年老的爺爺奶奶和已經成年的孫女兒打地鋪。這種情況到1980年代中期還沒有大的改變。同年，筆者到天津鋼絲繩廠調查得知，這個廠六至九口人住13平方米以下的有82戶，老少三代住一間房的有29戶，婚後無房的有47戶，無房結婚的有8戶，危房待修的有7戶。這些工人都要上夜班，白天需要睡覺。但在這樣的居住條件下，白天他們是無法睡覺的。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為3.8平方米；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下降到3平方米。1950年代初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臨時住宅，一直住到1980年代。夏天，在這擁擠、破舊、骯髒的工棚裏，做飯的煤球爐都排在1米寬的公共過道裏，過道的溫度高達攝氏39度。中年婦女脫光了上身，隨着炒菜的鍋鏟掀翻，碩大的乳房在晃動。這是筆者和同事杜潤三在天津佟樓附近一片工人住宅區目睹的情景。

工人的工作環境也很惡劣。1972年9月14日，天津勞動衛生防治院向筆者提供了他們剛完成的一個調查：

在對天津市981個工廠的37,720人的不完全統計，對四種作業(矽、鉛、苯、汞)的工人中查出：

鉛吸收	343人
苯中毒	39人
白血球降低	86人
汞中毒和汞吸收	134人

天津棉紡二廠三紡筒子車間184名職工患病的達126人，佔百分之69.5%，有的患病在二、三種以上。天津乾電池廠幹汞電池車間的125名工人幾乎每人汞中毒，一度造成停產。天津紅衛皮鞋廠、十月皮鞋廠苯中毒十分嚴重。天津化工廠周圍1,500米的範圍內空氣中汞的含量超過國家標準，電解車間85人中有76人汞吸收，佔總人數的89%。

六 根本問題是經濟體制

毛澤東等老一代領導人一直提倡「為人民服務」，這一代領導人也有卓越的能力，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也都勤勞節儉，為甚麼搞了幾十年中國還這麼窮呢？

這個問題最早的答案是，中國政府領導經濟的權力太集中。毛澤東在1956年就覺察到了權力過份集中的問題。他在這年春天所作的〈論十大關係〉報告中說：「把甚麼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餘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甚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④。毛力圖擺脫蘇聯的影響，探索中國自己的路。其中最重要的探索之一就是下放權力，調整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在二十世紀末的改革開放以前，有三次比較集中的舉動。

第一次權力下放是1958年。按照「統一計劃，分級管理」的原則，擴大省、市、自治區的經濟管理權限。除了一些重要的、特殊的以及「試驗田」性質的企業以外，其餘企業原則上一律下放給地方管理。6月2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企業、事業單位和技術力量下放的規定〉，中央部門直接管理的1,165家企業，下放了885個，下放比例為76%，不到半個月時間完成了交接工作^⑤。

1958年中央下放權力以後，地方政府有權投資建設，一時「五小」工業遍地開花。這為以後地方工業的發展打下了初步基礎。但是，地方政府官員把高指標當作政績，不按經濟規律辦事，因而宏觀經濟失控，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1959年6月，毛澤東說：「現在有些半無政府主義，『四權』過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亂，應該強調一下統一領導，中央集權。」^⑥中央部門開始收回企業。到1960年代初，又回到「一五」時期領導經濟的權力高度集中的狀況。

第二次權力下放是1964年。中央將十九個非工業部門的基本建設投資劃歸地方安排；「五小」企業的產品基本歸地方分配；適當擴大地方的財力；適當擴大地方調劑物資的權限等等。和1958年相比，這次的動作比較小，地方政府還是覺得沒有發展經濟的權力。

1966年3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中央還是虛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針、政策、計劃。中央叫計劃製造工廠，只管虛，不管實，也管點實，少管一點實^⑦。根據這個精神，醞釀着下放企業給地方政府管理。不久，由於文革開始了，因此被擱置起來。1969年，社會稍見穩定，這個問題又重新提上了日程。同年2月召開的全國計劃座談會

上，討論了〈中央各部關於企業管理體制下放的初步設想〉，在條塊關係上傾向「以塊塊為主」，凡是適宜於地方管理的企業，都下放給地方管理，由地方各級革委會對企業實行一元化領導。1970年計劃會議上批判「條條專政」，「條條」是指中央各部委，說中央部委管得過多，統得過死。這次會議決定把中央部門管理的企業下放給地方政府管理，要求各省盡快實現主要產品自給。到當年9月底，中央工交九個部共有企事業3,082個單位，已下放給地方的有2,237個，佔總數的73%，其中完全下放給地方政府的有1,412個，雙重領導以地方為主的有814個，雙重領導以中央為主的有11個。經過這次下放，在很短時間內，就把鞍鋼、大慶油田、長春汽車廠、開灤煤礦、吉林化學工業公司等2,400多個企業下放給省、市、自治區管理，有的又進一步下放到市、縣。這是第三次權力下放^⑧。

像1958年那次下放企業那樣，此時又出現了重複建設、盲目生產、地區分割的現象。此外，中央下放給地方的大型企業，原來面向全國的產銷關係被割斷，地方無力解決，經營更加困難。上海以前每年從鞍鋼、武鋼等鋼鐵企業調入生鐵200萬噸，這些鋼鐵企業下放到地方後，上海就得不到生鐵。有的已經下放到地方的企業，中央部門還讓它分擔產品計劃指標，但只給任務，不給材料（材料廠已下放，中央部門無法供給），造成「只轉戶口，不轉糧食關係」的局面^⑨。由於問題多多，1970年下放的企業，很多後來又收回中央管理。

在文革中，下放企業被稱為「經濟體制改革」。當時的「改革」，除了下放企業以外，1971年開始實行地方包乾：一、基本建設投資大包乾；二、物資分配大包乾。在國家統一計劃下，實行「地區平衡、差額調撥、品種調劑、保證上繳」的辦法；三、財政收支大包乾。在國家統一預算下，對地方政府實行「定收定支、收支包乾、保證上繳、結餘留用」的辦法；四、擴大地方權限，實行「塊塊為主，條塊結合」的計劃管理體制^⑩。顯然，文革中稱為「經濟體制改革」，只是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是行政性分權，對搞活企業沒有多大作用。

此外，每次下放權力都要出現經濟混亂，為治理混亂中央不得不集中權力；而每次集中權力地方政府就要叫喊；叫喊聲強烈，又不得不再下放權力。「一統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統」，國民經濟總是跳不出這個循環。

事實證明，「權力過份集中」的問題是存在的，而且相當嚴重，但不是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本所在。那麼，甚麼是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呢？這個問題在毛澤東時代是不可能找到正確答案的。1990年代初期經濟界的共識是：根本的問題是在資源配置用人們的主觀判斷來代替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這裏所說的「主觀判斷」就是人們制訂的計劃，「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就是市場規律。

毛澤東等一代人從馬克思、列寧那裏把改造社會和管理經濟的理論接受過來：國家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將被消除，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毛要求下放企業時還強調中央是「計劃製造工廠」，地方政府和企業要執行這個「工廠」製造的計劃。毛的分

權是行政性分權，即管理企業的權力只是由一級政府下放到另一級政府，企業生產甚麼，生產多少，用甚麼方式生產，還得聽命於政府的安排。

文革中，毛澤東一再批評商品經濟，主張按價值規律辦事的孫冶方也被打成「修正主義份子」被投入監獄。沒有市場競爭，價值規律不起作用，一切聽命於各級行政官員的指令。價格是市場經濟的靈魂。西方經濟學有一句名言：要摧毀一個國家的經濟，最有效的辦法是麻痺這個國家的價格機制。文革期間，由於過度的行政控制，價格機制被完全麻痺。1966至1976年間，中國零售物價指數不僅沒有上漲，還下降了兩個百分點（表8）。這是用行政手段凍結物價的結果，它對工資一直很低的職工來說當然是必要的，但對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力有很大的殺傷力。

表8 文革期間全國零售物價總指數

年份	1965	1966	1967	1968	1970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物價指數	134.6	134.2	133.2	133.3	131.5	130.2	131.0	131.7	131.9	132.3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4）》，頁425。

說明：以1950年為100。

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隨着國際關係的改善，在毛澤東、周恩來生命的最後幾年裏進行了大規模技術引進。1972至1977年，中國先後從日本、聯邦德國、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十幾個國家的廠商，簽訂了250多項新技術和成套設備的引進合同，成交額達396億美元^①。此外，還引進了13套大型化肥成套設備、43套綜合採煤機組、3座大型電站設備、一米七軋機整套生產設備、3套大型石油化工設備和4套大型化纖設備等^②。

文革中，不斷批判「洋奴哲學」、「崇洋媚外」，人們「談洋色變」。中國彩色顯像管生產線考察團到美國康寧公司訪問，這家公司送給考察團一個工藝蝸牛作為禮品。1974年2月10日，江青在四機部（後來的電子工業部）說：美國人這是「罵我們，侮辱我們，說我們爬行」。這件事被稱為「蝸牛事件」^③，使得引進彩管生產線推遲了幾年。

「談洋色變」的心理直到改革之初還沒有消除。在1980年代初，正是這些引進項目落實的時候，一些單位把對外經貿談判當作「一場特殊的國際階級鬥爭」，在談判桌上設「前線政委」。一些引進國外技術的工廠，把來廠履行合同的外國專家當成「外國資本家的代理人」。職工不敢單獨接近這些外國專家，怕被人說成「裏通外國」。所以，這些單位和外國專家的關係十分緊張，常常影響工程進展^④。

1976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只有134.4億美元（其中出口68.6億美元，進口65.8億美元）^⑤，不到世界貿易總額的7‰。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竟佔比如此之小，可見當時中國對外經貿往來的水平何等低下。

毛澤東、周恩來批准的這些成套設備的引進，使十分匱乏的國民經濟如飲甘泉。但是，這只是設備引進，不僅排斥先進的管理制度和企業經營制度，

更是排斥國際經濟的遊戲規則。文革中的技術引進和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不可同日而語。

文革結束了，留下的不僅是極端貧困，而且留下了造成極端貧困的體制：排斥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為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留下了空間。

註釋

① 筆者對「計劃經濟缺乏技術上的可行性」有過論證。參見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紀實》（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上卷，頁25-27；下卷，頁309-12。

②⑧⑨ 梁秀峰、李建立：〈新中國國民經濟計劃工作的三十年〉，《經濟研究資料》，1984年第6期，頁1-22；1-22；16。

③⑲⑳㉑ 李成瑞：〈十年內亂期間我國經濟情況分析〉，《經濟研究》，1984年第1期，頁23-31；29；23；25。

④ 陳東林：〈研究「文革」時期國民經濟的幾點思考〉，《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4期，頁43-49；〈實事求是地評價「文革」時期的經濟建設〉（1997年8月1日），當代中國研究所網，www.iccs.cn/contents/301/8125.html。

⑤⑥⑥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1192-1211；798-99；802。

⑦ 房維中：〈我們所經歷的六個五年計劃〉，《宏觀經濟研究》，1983年第5期，頁3-9。

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 柳隨年、吳敢群主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1949-1983）》（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頁383-84；363；383-84；386；421；414；388；371-73；377-78；380；421。

⑲⑳㉑ 馬泉山：《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66-1978》（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89），頁83-84；83-84；377。

㉒ 曾壁鈞、林木西主編：《新中國經濟史（1949-1989）》（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0）。

㉓ 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

㉔㉕㉖㉗㉘㉙ 陳東林：《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頁434-35；414；434-35；413；410、418-29；437。

㉚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㉛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頁317。

㉜ 朱佳木：〈中國工業化與中國共產黨〉，《當代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6期，頁30-45；〈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的探求與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2期，頁10-21。

㉝ 本文的資料，除了註明來源的以外，都是來自筆者的採訪筆記和親身體驗。

㉞ 陳雲：〈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3月7日），載《陳雲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210；周恩來：〈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和當前任務〉，載《周恩來選集》，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371。

㉟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199-1200。這裏說6月6日，《毛澤東年譜（1949-1976）》說是6月8日。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357。所謂一、二、三線，是按中國地理區域劃分的，沿海地區為一線，中部地區為二線，西部地區的雲南、貴州、四川三省全部或大部及湘西、鄂西為西南三線，陝、甘、寧、青四省全部或大部及豫西、晉西為西北三線。三線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為大三線，中部及沿海地區省區的腹地為小三線。

- ⑲ 余秋里，石油工業部長、「小計委」主持人。毛嫌國家計委不順手，1965年初成立了「小計委」，負責重大戰略事項。
- ⑳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1949-1976）》，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803。
- ㉑ 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與大區第一書記的談話。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頁534。
- ㉒⑳㉓ 陳清：〈工業學大慶運動始末〉，《黨的文獻》，1994年第6期，頁34-59；36-37；37。
- ㉔⑳㉕ 楊繼繩：〈天津勞動生產率調查〉，《國內動態清樣》（新華社），1972年10月21日。
- ㉖ 《人民日報》，1964年2月10日。
- ㉗ 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1964年12月21、22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468-69。
- ㉘ 陶魯笏：〈讓大寨精神遍地開花結果——山西農村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的初步總結〉，《紅旗》，1965年第11期，頁4-14。
- ㉙⑳⑳ 陳大斌：《大寨寓言——「農業學大寨」的歷史警示》（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頁143；213。
- ㉛⑳⑳⑳ 陳大斌：《飢餓引發的變革：一個資深記者的親身經歷與思考》（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頁370；363；17。
- ㉜ 吳思：《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試驗》（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頁314。
- ㉝ 這件事是李玉秀1972年在《人民日報》社開會時告訴筆者的。
- ㉞ 〈陳再道在文革中的口頭檢查〉，載史實編著：《文革中的檢討書：檢查也是一門大學問》（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1），頁251。
- ㉟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頁556。
- ㊱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財政》，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261。轉引自陳東林：《三線建設》，頁20。
- 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00。
- ㊳ 馮森齡，1940年入黨，曾任延安《解放日報》記者，文革後任新華社陝西分社社長。
- ㊴ 馮森齡：〈延安有很多農民上街討飯——延安調查之一〉，《國內動態清樣》，1978年8月24日。
- ㊵ 馮森齡：〈延安很多農民去年口糧不到100公斤——延安調查之二〉，《國內動態清樣》，1978年8月24日。
- ㊶ 傅上倫等：《告別飢餓——一部塵封十八年的書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17。
- ㊷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1949-1983）》，頁420。本文表3也顯示文革期間工資下降的情況。
- ㊸ 《解放日報》（上海），1988年10月14日。
- ㊹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273、275。
- ㊺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頁569。
- ㊻ 筆者當年聽過新華社的傳達。另可參見馮鳴：〈江青炮製的「蝸牛事件」〉，《鍾山風雨》，2005年第1期，頁30。
- ㊼ 楊繼繩：〈天津化纖廠注意調動外國專家的積極性〉，《國內動態清樣》，1980年6月21日。
- ㊽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90）》（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0），頁641。